

◀ (上接10版)

直接而有力。”创作时间和地点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九日于虹口四达里”。四达里正是他们“铁马版画会”的所在地。他还说：“这是我最近完成的第三部的习作。”也就是说,当时温涛在上海完成了三部木刻连环画。但是,笔者未能找到其他两部木刻连环画。就现存美术史料而言,《她的觉醒》只能归为新兴版画史上第一部表现抗日战争的木刻连环画。温涛在1936年冬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等处工作。1940年代,在桂林、香港等地从事书店和报刊编辑工作,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50年病逝,年仅43岁。

颇为巧合的是,抗日战争中涌现的另一部中篇木刻连环画《仇》,其作者张明曹,与前述1933年木刻连环画《卖盐》作者郑野夫既是温州同乡,又是上海美专同学。

张明曹(1911—1978)在浙江温州瓯海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就读,响应鲁迅先生倡导新兴版画运动而加入野风画会、MK木刻研究会和中国左翼美学家联盟,期间结识中共党员,受邀负责左翼美联组织工作,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同样是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骨干之一。其中参与MK木刻研究会的创作尤其活跃,曾四次举办MK木刻研究会作品展览,鲁迅先生曾前往观赏,并购置其中的一些作品。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明曹即返乡浙江温州乐清,在温州组织“黑白木刻研究会”,举办“战时木刻函授班”,在温州街头绘制了大量抗日救亡宣传壁画,掀起了抗日美术宣传热潮。他还创办和主编《抗敌漫画》期刊,同时创办“游击文化社”来出版抗日书刊。他创作表现抗日故事的中篇木刻连环画《仇》,便是由游击文化社作为“游击丛书之二”出版。

木刻连环画《仇》共二十幅作品,描绘了一位铁匠,家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中被毁,只得带着妻儿逃难,但在半路又遇日军。日军凌辱并杀害了他的妻子,又强迫他去为日军做苦力。有一天夜里,他趁守卫的日本兵不备,夺下武器杀死日本兵,进行了第一次复仇。铁匠逃生后投奔了抗日游击队,之后经过军事训练后不断击杀日本侵略军,以报国仇。《仇》的二十幅版画基本上统一在富于律动感的刻刀线块组合画面中,实属难得。《仇》自1938年11月初版1000册,至1939年3月

第三版4000册,当年是一部相当受读者欢迎的著名木刻连环画。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明曹重燃原先所学的中国画创作热情,精心创作100幅中国画作品,在上海西藏路八仙桥青年会举办展览。新中国诞生后,被当选为温州市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第一、第二、第三届温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重返上海,应聘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专职连环画家,相继创作有《瑞典火柴》《威尼斯商人》《追匪记》《云间摆渡》等十多部中外题材的连环画。他还兼任上海人美社为编辑工作人员开办的进修班的授课教师。令人欣慰的是,他的三位女儿(张迪平、张雷平、张淳)都成为有成就的中国画家,传承了他的艺脉。1999年6月,张明曹夫人王冰廉女士(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及其子女,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捐赠了张明曹抗战版画作品并永久陈列。

还有一位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木刻版画创作者是浙江遂昌人杨可扬(1914—2010)。1935年秋,他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因交不出学费,三个月后退学回乡。1936年8月,李桦主持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发起举办“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到杭州巡回展览,杨可扬前往参观后被大量新兴木刻版画作品的魅力深深感染,立志从事新兴木刻版画创作。他意识到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版画的基地在上海,于是在1937年春重返上海,加入由新兴版画运动早期骨干之一马达主持创立并担任艺术指导的“刀力木刻研究会”。杨可扬很快掌握了木刻版画从构思起稿到上版刻作和拓印全过程的技法及技巧,从而在木刻版画的创作实践中逐步成为了新兴版画运动第二代版画家中之杰出的一位。杨可扬最初在国共两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在1939年1月创刊的浙江《民族日报》担任文字和艺术编辑,不断发表木刻版画作品,其间经党组织考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郑野夫主持的“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工作,参与编辑《木刻艺术》杂志、与郑野夫、邵克萍合著《给初学木刻者》、撰专著《新艺散谈》、创作版画集《民族健康》等。抗战胜利后随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迁至上海,出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办公室设在上海大名路65号,被推举担任驻会工



木刻连环画《她的觉醒》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日示威游行”



《她的觉醒》之“主人公参加抗日医疗救护队”

作,负责《木刻艺术》杂志的复刊工作,参与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览”和编辑出版《抗战八年木刻选集》等大量事务,又主编在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出版的《时代日报》上的《新木刻》专刊,以及随后出版的《新木刻》版画集等。就在如此忙碌的工作中,杨可扬构思创作了长篇木刻连环画《英英的遭遇》。

《英英的遭遇》共有五十五幅版画组成,表现来自日常生活的一则故事:一位农妇在重男轻女的旧观念中产下一名女婴,祖母主张溺掉女婴,但在生母的争取下保下了女婴,取名英英。英英在贫困的家庭中寂寞地生活着,在五岁时被送到另一个贫困家庭做童养媳,小小年纪每天做着繁重的劳务,遇到农荒年时更是艰难。不料,英英未来的丈夫不幸病死,于是她又被卖到地主家,更是受尽劳役之苦。英英慢慢长成漂亮的姑娘,地主动了坏心,但英英极力反抗,于是又被驱逐出门,踏上了未来迷茫之路。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英英在流浪中遭遇日本兵,险遭欺凌时被抗日游击队搭救。于是英英加入了游击队并参与抗日斗争。在与游击队员的相处中英英感到了同志之间的温暖,同时还能有机会和同志们共同学习文

化知识,并与一名游击队员产生了爱情。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她与那位游击队员到了上海,结为夫妻。英英在街头摆书报摊出售思想进步的书籍,丈夫则拉车为业。不久解放战争开始,英英的书报摊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而丈夫又被拉了壮丁去打仗。不久英英产下婴儿,由于生活无着落,无奈只能带着婴儿行乞……这部木刻连环画于1949年临近上海解放的4月9日开始在上海《大公报》连载,刊登到第43幅时却嘎然而止,停刊的当天,《大公报》“编者的话”中含蓄地说:“可扬先生的‘英英的遭遇’分为上下两集,上集已刊完,下集尚在整理中。”显然,因为整部木刻连环画内容涉及揭露国民党政府发动大规模内战的真相,《大公报》迫于压力而宣告暂止。实际上,未刊载完的《英英的遭遇》还表现了丈夫所在的国民党军队后来起义投诚解放军,以及,上海解放后夫妻重逢,终于过上了安定快乐的新生活的情节。后来,《英英的遭遇》整套木刻版画被结集成单行本,1950年由郑野夫、陈烟桥主持的上海大众美术出版社出版。

杨可扬的长篇木刻连环画《英英的遭遇》,可谓是精深刻作和精到刻作的木刻艺术

精品,所有画幅均被统一在简洁、朴实、敦厚的艺术风格中,耐人寻味。

一向做事认真的杨可扬,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倾力于出版各类新兴版画集和相关论著期刊,例如,1956年6月开始,作为常务主编(其他主编为李桦、力群、郑野夫、赖少其)主持出版《版画》双月刊;1980年6月起,主编出版《版画艺术》季刊;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和鲁迅倡导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周年,他与李桦商量发起,征集作品,编辑《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于1981年9月出版;亲自组稿出版邵克萍著《木刻的实习和创作》、赵延年等集体合著《版画技法经验》等新兴版画创作技法和经验谈著作;此外还协助上海鲁迅纪念馆将鲁迅先生收藏的中国青年版画家近二千幅版画作品编成五卷本《版画纪程——鲁迅藏中国现代木刻全集》,于1991年9月出版,等等。杨可扬为继承发扬中国新兴版画优良传统,推动新中国版画艺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新兴版画运动的组成部分,新四军中的版画家于1942年创作的长篇木刻连环画《铁佛寺》,也值得重视。

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在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一部分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主要活动区域在江苏、安徽和浙江。因为靠近上海,所以,上海有许多进步知识青年和文化人,在抗日爱国情怀的激励下投奔新四军,其中就有版画家吕蒙、芦芒、莫朴、黎鲁、吴来云等。长篇木刻连环画《铁佛寺》,就是以吕蒙为主,另有莫朴、程亚君共同参与创作的。

《铁佛寺》的创作在脚本几经易稿最后定稿之后,就以每天创作刻绘三四幅乃至五幅的速度进行着。其间,曾险遇两次敌寇大扫荡而转入急迫迂回游击战,程亚君又从淮南调至皖中新四军四师工作,莫朴奉调延安鲁艺任教,只剩下吕蒙一人继续创作。吕蒙在革命的责任感的驱使下夜以继日地创作,竟能每天创作五至六幅,超过了原先三个人每天的工作量,于是很快完成了《铁佛寺》一百一十幅作品。

(下转12版) ▶